

二二八事件期間留臺日人之見聞

吳文星

目次

- 壹、前言
- 貳、二二八事件前對各項情況之觀察
- 參、二二八事件期間之經歷與見聞
- 肆、結論

壹、前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投降，結束在臺五十一年之統治，據稱當時在臺一般日人總數約四十萬人（另陸、海軍約二三七、五〇〇人）（註一）。一九四六年二月起，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開始正式遣送在臺日人返國，惟爲了清理業務、維持生產事業之運作及特殊之需要等，而有徵用日人之舉措。四月底，計留用日人及其家屬二七、六一二人。其後，繼續進行遣返工作，迨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夕，仍留用日人九一九人、家屬二、四〇三人，合計三、三二二人。由上可知，戰後最初一、二年間，留臺日人乃爲數不少，其對當時臺灣政治、經濟、社會之見聞和體驗，尤其是二二八事件期間之見聞、遭遇及因應做法，以及與行政長官公署之互動關係等，毋庸置疑的，亦有助於吾人適切瞭解二二八事件之原因、經過、結果及其影響。

有鑑於此，本文擬根據當時的官方報告、關係團體之記錄、個人回憶文字等資料，將日人對於二二八事件前各項情況之觀察，二二八事件期間之經歷和見聞，以及對二二八事件之看法等，略作彙整歸納，藉期吾人對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後果能有更周延的掌握和瞭解。

貳、二二八事件前對各項情況之觀察

一、對來臺中國軍隊之觀察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臺灣紳民間此喜訊，莫不歡欣鼓舞，紛紛舉辦慶祝活動。同時，對祖國有著極高的期待，於是各地陸續成立「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三民主義青年團」、「治安服務隊」等組織，配合政府的接收準備與地方秩序的維持，一心等待祖國接收人員的到來。

十月十六日，傳聞國軍將抵達基隆，於是民衆歡欣鼓舞，準備盛大歡迎，基隆碼頭更是人山人海，無不以能先睹國軍陣容爲快。但是，當日國軍艦艇不及開進，許多歡迎的民衆乃夜宿碼頭，通宵達旦等待著。翌（十七）日，國軍抵達基隆，分乘火車開進臺北，三十餘萬市民更是夾道歡迎。在臺人的歡迎行列中，也有不少日人前往觀看。在他們的回憶文字中，都不約而同地提及中國軍隊粗陋的軍容及臺人錯愕

、失望的神情。一九四六年臺北帝國大學農學部獸醫學科畢業生佳山良正寫道：

臺北城內的大樓已掛上了「歡迎祖國軍」的橫布條。市民們爲了觀看進駐軍的行進，群集於主要道路。軍隊從臺北車站往舊日本軍師團和聯隊兵舍行進。我想像舊軍隊行進在寬闊的柏油路上，並在腦海中描繪出四列縱隊的隊伍堂堂行進的景象。但是，現在只有兩列隊伍，而且每四人中就有一個人扛著扁擔，竹編的籠子裡堆積了鍋、釜等炊事用具和暫時夠用的糧食。舊槍枝和雨傘放入網中斜背著。而且，令人吃驚的竟然有相當多的士兵是打赤腳。未打赤腳的士兵也都穿著像運動靴的布鞋，非常輕快地走著。因爲扛著扁擔，拉開了前後的間隔，因此二列隊伍變得非常長。士兵穿著清一色的藍色制服，也有沒綁腿的，不太統一。當然也沒有軍樂隊，隊伍雜然地前進。

臺灣人迎接這樣的進駐軍時，表情是複雜的，只有少數直率地表示出歡迎的喜悅，不知不覺中歡呼聲逐漸減少，僅默默地站在旁邊看著。作爲臺灣人來看，所謂的進駐軍即使不像美軍，至少也要像日軍所組成的隊伍，然而期待威風凜凜的軍容完全落空。而且對於讓這種後進國的軍隊統治，當然也開始感到顯著的不安。他們大概是來自中國的深山中吧！因此對臺北的一切都是感到稀奇、驚異的，有的甚至連電力、自來水、瓦斯都不知道（註二）。

臺北高等學校學生竹內昭太郎亦回憶道：

士兵當中有背上背著傘的，實在令人大吃一驚。

我們小時候在漫畫書上看到的情景，現在竟然真的出現在眼前。是撐傘抵禦砲火攻擊，還是下雨時撐傘而不打仗了呢？

然而，要緊的是正確的斷定事情。偶然的剛好下起雨來，我們就看到士兵突然打開了傘，從後面跑到站在隊伍前面的軍官旁邊。並不是所有的士兵都有帶傘，是由軍官旁邊輪值的士兵帶著，軍官是不能淋濕的。因此，戰鬥之際傘是沒有關係的，下雨時，應該也沒有全體士兵都帶傘行軍吧。

又有一個發現是不可思議的。毫無例外的，軍官和士兵的臉是完全不同的，無論哪一個軍官，都是瘦瘦的體型、白皙的臉，所謂知識份子的臉，說起來就像是代表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顧維鈞那樣的臉，士兵則毫無例外是農民的臉。鮮有不同的臉，雖然是蜿蜒長列，但是終究沒有見到。日本陸軍士兵中，有我們、高見先生及犬養先生。美國的軍官和士兵，單憑臉是分不出來的。這樣看來，與中國大陸相較，日本和臺灣可說是相當進化的人類社會吧（註三）！

原服役於「臺灣敢一三八六部隊吉川隊」的田ノ上家久之回憶錄亦云：

十月中旬，由於聽到中國國民黨軍隊登陸的消息，因此前往樺山町的大街上看看。雖然聽說是蔣介石直屬的精銳部隊，卻是兩個人扛著煮飯用的大鐵鍋，拖長隊伍步行著。其中，也有將傘斜背在背上的人，完全不像軍隊行進的樣子。臺灣人看到簡直難以置信，又驚又悲，其神情使我們不禁興起同情的念頭。其後，

如預料中的，進駐的國民黨軍隊連日不斷出現非法的行為，因此，向來強烈對日本人的反感和憎惡之情日漸減少，對我們而言，可說是件幸運的事（註四）。

影響所及，臺人態度隨之漸轉變。原臺南市寶國民學校校長島津憲房回憶表示：

各種的謠言與情報使人們更加苦惱。美軍進駐臺灣不久，蔣介石的軍隊也登陸了，但我們最關心的日人處置問題卻一再生變。另一方面，反日臺人的暴力、強盜、侮蔑、脅迫等情事日益惡化。但經過二個月後，臺灣人十分驚訝於進駐臺灣的蔣介石軍隊的士兵和要人們低劣的教養，相反的，轉而對日人表示盛情，甚至懷念日本的統治（註五）。

二、對接收情況之觀察

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臺灣、澎湖正式成為中華民國版圖。十一月一日起，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展開對臺灣總督府各部門的接收工作。關於接收之弊端，向來的研究已指出接收人員以勝利者、征服者的姿態自居，長官公署重要職位幾乎由外省人所壟斷，更令臺人難以心服。同時，官員及軍憲警將接收變成「劫收」，而有所謂「五子登科」之現象，其尤甚者貪污腐敗、無法無天（註六）。當時民間流傳的歌謠遂諷頌云：「轟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此一情形，留臺日人亦有同樣的印象，例如佳山良正之回憶錄即指出：

中國軍隊進駐後，在總督府原址設立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按：係在原臺北市役所），在臺灣軍司令部設立臺灣警備司令部。其後，開始接收官營、公營設施和企業資產，以及民間企業設施。除了土地外，接收的財產中有公家設施五九三件、價值二九三、八五〇萬圓，民間企業有一、二九五件、價值七一六、三六〇萬圓，民間私有財產四八、九六八件、價值八八、八八〇萬圓，合計共一、〇九九、〇九〇萬圓。從當時的幣值來看，是相當大的資產。

國民黨政權真是平白得到這些資產。但是，接收過程中卻變成官員中飽私囊的結果。國民黨政權官僚貪污瀆職之風實在讓人看不過去。接收當時，日本人確實調查作成的財產目錄，被中國官僚竄改和私吞。對接受日本教育、擁有現代國家市民意識的臺灣人而言，在驚訝中國官吏公私不分和腐敗之風的同時，對臺灣的前途感到極大的不安。

日本統治下，以總督府為首的行政機關和企業，對臺灣人有差別待遇，臺人極少能夠擔任上級職位，但是在下級職位中仍然有許多優秀的臺灣人。這些人當然期待新政權的職位。但是全部的管理職位悉被大陸人佔據，而且這些大陸人在學識、經驗、能力各方面幾乎都是相當低劣，因此對有能力的臺灣人而言，實在是件令人無法忍受的事情（註七）。

另一方面，據一九四六年二月外務省南方課的內部報告顯示，日人認為長官公署的施政欠缺計畫，各項施策緩慢，因而未獲得臺人之信賴。報告中略謂：

雖然陳儀長官表明臺灣三大行政措施為民生向上、教

育普及、創立民意代表機關，但仍未見其實現。概因行政能力薄弱，以致臺人對長官公署的信賴感極為不足。駐臺北的美軍軍官亦指摘中國當局施政欠缺計畫及各項施策遲緩，顯然有陷入新的經濟混亂之虞。據觀察，國有財產等之接收可能需數年之久（註八）。

再者，社會秩序漸次變化，競相發「光復財」，軍人則風紀不佳，乘機需索。古野直也具體指出：

在臺灣的外省人與本省人正為爭奪日產而仇視時，安靜的日本人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的人。島內的道德變成低劣的競爭，鐵軌被拆走，電線被切斷變賣，公共建築物被破壞，甚至學校的玻璃窗也被拆走（註九）。

此外，傳染病再度流行，當時擔任省立共濟醫院醫師的

松延正已回憶云：

隨著外省人增加，霍亂、天花開始流行，醫院也忙亂起來。向美軍要求免費供應未滿周歲病童的奶粉。清晨排列在醫院玄關的病人中，發現有天花患者。根據衛生局的防疫對策，上述傳染病很快就被消滅（註一〇）。

三、對接收後經濟狀況之觀察

關於經濟狀況，報告中指出，由於採通貨緊縮措施，一般企業停工，安定狀態十分薄弱。隨著生活必需物資配給機關之廢除，物價已呈上漲之勢，一九四六年一月之物價指數較乎半年前戰爭結束時上揚情況，糧食為一一·八％、衣料一六·八％、燃料一一％、金屬製品二五·三％（註一一）。三月，外務省南方課的內部報告進而指出，雖然隨著戰爭結

束而解除糧食物資惜售、買備心理，惟因預期紙幣貶值之心理，乃產生「換物思想」，競相領出存款，購買土地等不動產，造成不動產價格暴騰，加以生產銳減，更加速物價之飛漲（註一二）。一九四六年臺北帝國大學農學部獸醫學科畢業生佳山良正回憶：

臺灣儲存著堆積如山的米和各種物資。看中這點的中國小商人，以特殊的嗅覺打聽，群集而來。接著，一轉眼間，國民黨的官僚和商人把這些物資運到大陸。臺灣人賣掉這些物資後，得到的紙幣卻因急速的通貨膨脹而形同紙屑。街上到處是失業者，僅僅一年間，經濟嚴重地蕭條。

這是我離開臺灣之後的事，我最後留在臺灣的時間是昭和二十一年二月（註一三）。

原高雄州旗山郡、屏東郡庶務課長山本守喜回憶一九四六年初其生活之窘況：

（臺北）市內物價以糧食為中心日日攀升，若一家八口按正常吃三餐，則在中華民國政府工作一個月的薪水五天就用完了。即使有一些積蓄，仍過著變賣家當度日之生活。衣類、裁縫機、腳踏車等原都是花不少錢買的，而衣櫥僅賣一百圓、附鍋子之澡桶僅賣八〇圓，不忍痛割愛則難以維生（註一四）。

當時臺灣大學留用的教授富田芳郎之妻富田奈美回憶文字中亦有如下之表示：

臺灣大學理農學部等留用的日人教授、副教授由於擔任講座，每個月薪資都稍有調高，到夏季時約有數千圓的收入。儘管如此，由於物價直線上升而至騰貴，

因此生活變得艱苦。主食等所有東西都是自由販賣，只要有錢什麼都能買到，但是若買主食的話，半個月的薪水就沒有了（註一五）。

要之，由上述具體的生活經驗顯示，即使是中、上收入的薪水階級，因物價騰貴，生活的確十分窘迫。

當時被留用的原總督府主計、用品課長鹽見俊二，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日記中表示臺灣的狀況日漸惡化，主要的原因在於（一）行政長官公署的施政和治安未上軌道；（二）糧食不足；（三）臺灣人的政經期待落空而日漸不滿；（四）物價騰貴以致生活日益困難；（五）生產停止；（六）治安漸次惡化。指出由於上述原因，臺灣的社會和經濟將不可避免會陷入混亂；在臺日人亦有責任使混亂的期間縮到最短及使混亂的犧牲降到最小，惟由於複雜的環境，可說難以盡到該責任（註一六）。

四月完成的〈臺灣統治終末報告書〉中表示，在臺日人由於生計困難及臺灣治安堪慮，而紛紛希望返國。略謂：

留用日人職員因物價騰貴，難以維持生計，而陷於窮乏；加以對治安的不安，因而絕大部分希望返國，雖然中國官員加以慰留，仍執意要求解除留用（註一七）。

五月，長官公署民政處日僑管理委員會世話役（服務員）速水國彥，給日本內務省臺灣總督府殘務整理事務所的報告中，談到臺灣經濟狀況時指出，生活必需物資依然持續欠缺，米價繼續上漲；礦業在接收之後產量銳減；為工業之大宗的製糖業則主要工廠受到戰禍之破壞而復舊困難，大小工廠均處於生產停頓狀態；至於農業則出現近年來未曾有的旱災和肥料短缺而導致欠收之現象（註一八）。迨至十月，速水的報告進而指出物價已全面攀升至戰爭結束以來的高峰，由

於物價遠高於大多數民衆之收入，以致物資的需求量不多（註一九）。有一回憶表示，物價逐日暴漲之結果，十一月後更加嚴重，一斗米一週內從一元漲至十元，一週後，更從十元漲至百元（註二〇）。

不可否認的，稻米減產是物價不斷攀升的原因之一，上山英三回憶戰事結束前後稻米供需與物價之關係時，指出：

昭和十三年，臺灣米的產量有九八一萬石，至昭和十九年戰爭結束前一年，有七四七萬石，該數量作為終戰該年消費之需，所以從產米量也可以推定二十年仍是較好的。雖然無法掌握昭和二十年的產米量的數字，但根據各項資料，昭和二十年臺灣產米量只有四四七萬石，約減少一半。這當然對昭和二十一年有所影響，生產量的減少的確是一大原因。但同時，從翌（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起，臺灣米開放自由買賣。

由於無法再維持統制的米價，變成自由買賣，此後，都市中米的供需情形非常混亂，過去在日本統制下，米店擔任供需的角色，但現在沒有這樣的關係，都市中米的供需非常混亂。同時，無法徹底取締商人投機獲取暴利的行為，又無法控制米價，因此米價暴漲，並反映在所有零售價格指數上。因此，當時的經濟實況，大概可以集中在米的問題上來考慮吧（註二一）！

在上述政治、經濟日漸惡化之情況下，臺灣社會治安及民心亦隨之不斷有所變化。一九四六年初，外務省南方課對於臺灣的治安已表堪慮，在內部報告中略謂：

戰爭結束後不久，全臺民眾雖保持漠然、靜觀之態度，然而，隨著時日的推移，臺人對日人的感情漸次惡

之摩擦層出不窮：

當時爲臺北高校在學生的竹內昭太郎回憶臺人與外省人之摩擦層出不窮：

化，報紙上及在各地結成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學生聯盟等，對日本展開批判的言論，加以警察無能，以致各地暴行、強盜、勒索、要求日人立即退出臺灣等情事不斷發生，或襲擊舊警察署及警察官吏派出所，或毆打公司、工廠的幹部，或臺人學生毆打日人子弟等事件層出不窮，以致日人學生無法上學，臺北市大稻埕（臺灣人街）中，日人往來極不安全，在其他市街夜間通常亦無法外出（註三）。

因爲盤尼西林受到感謝的森先生的親戚，有位認識的軍官，想以六千圓賣掉他的相機，而拜託我。從離御成町二丁目不遠的淡水、北投線的雙連車站平交道，一直走到圓公園、大稻埕的途中的商店街，有一家照相館，雖然是臺灣人街，不過因爲是白天，即使一個人走也安全吧，就出門了。

我跟老闆說：「這是日本軍官用的照相機，性能不錯，要賣六千圓。」老闆很感興趣，便到處打電話。結果聽說這個牌子的照相機有單眼和雙眼，單眼的話，即使八千圓也有買主，但是雙眼的話，只能賣到半價四千圓。

此時，有一個像是中國政府要員、服裝體面的人走進店裡，看到我的相機，拿起來，以一副想買的樣子開始跟老闆商洽，轉眼間情況不妙。

老闆從那個人手中搶回相機，並大聲罵著。但是那個人一副冷峻的態度，（好像）惡言相向與老闆吵

起來，然後又把相機拿到手邊。老闆又再搶回。那個一手叉腰，一手邊向上推開，邊左右揮動，再三說臺灣臺灣的話。我想是在叫嚷著「臺灣人對客人的態度怎麼這樣？」我不在意買主高貴或不高貴，但要是相機摔壞了，我非賠四千圓不可。不管是被誰摔壞，我一心一意就只注意那個相機。

店門口已經聚集了成群的人，老闆與那個要員的爭吵不知何時變成外面那群人議論的焦點。要是日本人的話，不是將這個傢伙和對方斬首示眾，就是痛毆他們一頓了，但是這兩種情況都沒有發生。要員漸漸在爭論上佔了上風，因此很滿足，最後以得意洋洋的傲慢態度走出店外。那臺相機也沒事了。

店主還怒氣未消，以日語說：「那個混蛋又沒錢又吝嗇，發牢騷之前，應該把錢帶來啊，骯髒的中國混蛋！」

我問道：「對方說什麼話？」「起初是北京話，看我聽不懂，又改說福建話，那也是奇怪的話，與我們所說的臺灣話不一樣。到臺灣來就應該說臺灣話。」他人的吵架是很有趣的，但是臺灣人對祖國的官員爲何罵得那麼激烈？臺灣人於十月中旬，迎接來自祖國的軍隊，看到那種簡陋的裝備，感到失望吧！現在更可以看到臺灣人對日本人的憎恨已經轉以中國人爲目標（註三）。

四月，鹽見俊二的日記中，檢討戰爭結束之初超過半數在臺日人希望留臺，但自一九四五年底以降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希望返國者漸次增加，其原因在於臺人對日人之態度轉

爲露骨的壓迫，而報紙則不斷鼓動反日情緒，加以徵用日人問題具體化之後產生大量的失業者，日人普遍陷入貧困，物價日益上漲，以致生活極不安定。一九四六年初，治安漸亂，強盜事件頻頻發生，米價暴漲，以致生活喪失自信，二月中旬，對日人進行逮捕偵訊。影響所及，絕大多數日人均希望早日返國（註二四）。

五月，速水國彥的報告中，附上報紙上有關流氓橫行地方，勒索、強盜事件頻頻發生，由於生活困難而自殺者日漸增加，以及臺人對現狀深表不滿等之報導，呈現臺灣民心之動向（註二五）。迨至十月，其報告中指出，儘管長官公署、警備司令部將全臺流氓集中至臺北訓導營以來，結夥強盜事件顯著地減少，然而，另一方面，由於失業及物價飛漲，以致生活困難而獨犯竊盜罪者則大爲增加。其次，雖然武器之取締相當嚴格，然而仍有不少強盜使用槍械犯案。此外，失業者不斷增加，但因救濟措施不足，以致不堪生活困苦而自殺者爲數不少（註二六）。

綜上顯示，據日人之觀察和體驗，長官公署接收之後，由於政治、經濟措施諸多失當，以致社會及經濟情況迅速惡化，日人已明白指出臺灣的安定堪慮，隨時將有大暴亂發生之虞。正如十月八日鹽見的日記所指出的，戰爭結束之初臺人因期待當家作主、回歸自由經濟而歡天喜地，然而二、三個月後，顯著的物價飛漲、治安混亂，尤其是再出現昔日土匪橫行的時代，衛生狀況出現危機，物價飛漲導致生活困難等，開始產生一股不安之氣氛，戰爭結束之初歡天喜地之景象漸不復見（註二七）。

四、日人對遣送返國之回憶

一九四六年二月起，長官公署開始遣送日人返國，據規定，遣返之際每一日人可攜帶三十公斤以下之行李，內容爲衣物、飯盒、蚊帳、紙筆等日用品，另現金日幣一千圓（註二八）。關於實際狀況，古野直也指出：

臺灣軍在基隆、高雄兩港設置乘船地司令部，處理遣送軍人、日本人業務。基隆是由第九師團長田坂八十八中將負責，高雄則是第十二師團長人見秀三中將負責。人見中將在任務結束後，即以敗將無顏見祖國而自殺了。其心可謂壯烈。往日本的第一艘船意外地早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航，而至翌（昭和二十一、一九四六）年四月，遣返事務告一段落。被留用在中國政府和大學的日本人，以及根據美軍的指示暫停遣返的琉球兵與琉球人暫時留下。一般日本人的私有財產全被沒收。過去日本領有臺灣時也曾驅除清國人並沒收其全部資產吧！這是明顯違反國際法的。……雖然規定日本人只能攜帶三件行李，但在最後登船檢查時，行李仍受到中國兵刁難搜查，值錢的東西全部喪失（註二九）。

竹內昭太郎則回憶其經驗如下：

檢查開始了。前一位約六十歲的老人被扣下。雖然看起來不像是藏有危險物品的壞人，但在官員的眼中是令人懷疑的樣子。行李全部被打開來檢查，最後，半長靴被脫掉，士兵以小槌子敲開後跟，從裡面取出布狀的物品。打開看是什麼東西，原來是白底紅日

的日本國旗。士兵大聲斥喝。日本國旗被沒收了。中國兵看到日本國旗，或許更加深憎恨，但沒收一事則不是理性的態度。日本人只想慎重地保有自己的國旗，或許應該讓他們有這樣的自由吧！

雖然找不出金子和鑽石，但陸續沒收了銀製品和象牙製的麻將牌等。

輪到我的時候，檢查的士兵拿起三本作為我精神食糧的岩波文庫，反覆地翻閱全書，確定沒有任何東西掉出。他們大概以為書中有挾帶紙幣吧（註三〇）。

參、一二八事件期間之經歷與見聞

三月一日，日僑管理委員會管理組長周夢麟具函速水國彥，緊急通知留臺日人不得參加集會結社，以及擅離私宅與他人交際。三日，再度函請通知日人不得外出，以免發生意外事件。速水於三月五日向臺北市區日人發出通告，約束不得擅離私宅與他人交際，絕對不得批判此次事件甚或政治，迅速傳達當局指令，確實遵行而杜絕謠言，在自宅門首掛上戶長姓名牌以便識別，留用者須謹守規定等。六日，針對五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在報上指稱事件發生當天日人在「歡喜慶祝」，速水向日僑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周一鶚澄清，表示此一事件對全體留臺日人之生活、心理、經濟等方面均造成不好的影響，故日人無不祈望事件能早日解決。強調柯氏的指控為子虛烏有，請長官公署慎重調查（註三一）。

八日夜，長官公署宣佈戒嚴。十日，周夢麟組長再度向速水發緊急通知函，要其轉知留臺日人不得外出，並在住宅門首掛上戶長姓名牌以免誤會。同日，速水通知臺北市區日

人遵行，並提示若不得已須外出，宜穿著整齊，攜帶身分證，經過憲、警警戒線時宜態度從容，萬一受到盤查，宜沈著應付，依指示提示身分證（註三二）。

十三日，速水函覆周一鶚，表示正派員調查留用日僑家中有無藏匿事件為首人物，並表示其深信絕無此事，若有之，願負全責舉發和請求處罰。同日，長官公署要求調查留臺日人身體、財產受害和避難情形。十五日，速水轉達全臺各地日僑管理委員會查明示覆，臺北市有日僑管理委員會留用職員木村俊夫被殺；基隆地區銅礦籌備處事務處及宿舍於一日遭暴徒襲擊，日人職員十一人財物被搶，損失約十萬圓；高雄市海事工程事務所職員齋藤繁夫等十六人宿舍遭暴徒侵入，損失達一四三萬餘圓；其他地區則大多遭偷竊（註三三）。木村俊夫係因公出差遭難，故其後長官公署給予喪葬撫卹金臺幣二〇萬元（註三四）。

十七日，速水函請長官公署相信留用日人絕不至於參加此種盲動事件而受牽累，蓋留用日人均是已成熟且平素行動極其消極者、曾受高等教育而略知世界局勢者、多係農工科學技術人員無任何政治關係、多係被徵用不得已留臺工作者平日即希望早日返國。二十一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在臺灣大學圖書館向留用日人講話，表示雖傳聞事件中有極少數日本浪人參加，惟其相信留用日人均係有相當地位、知識豐富的學者專家，絕對未參加事件。同時，其來臺前在報章雜誌上看到日本的廣播局呼籲臺人不可作亂，應服從中國政府；足見日本與此次事件無關。植物學教授日比野信一代表致謝辭，稱揚白氏識見高邁，理解深刻。並請求儘速發下留用人員的家族扶養金，以及讓有意返國者於適當時間遣送回國。二

十二日，通知各機關留用日人恢復上班（註三五）。

要之，事件期間行政長官公署深恐留臺日人參與其間，乃一再告誡、約束其行為；而留臺日人則力求自保，亦不敢造次，因此，大致平安無事。

至於事件期間在臺日人的個別見聞，例如省立共濟醫院醫師松延正已回憶其充滿恐懼的遭遇時，寫道：

昭和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在太平町菊元商店前的騎樓下，有位販賣美國煙的老婆婆遭到外省人專賣局監視員沒收並開槍一事為開端，事件突然爆發。群眾聚集到南門町專賣局本局，要求處罰加害者並對老婆婆賠償；接著，又到樺山町長官公署（舊臺北市役所），直接向陳儀長官陳情。剛好我經過那裡，在群眾後面眺望著並祈禱事件圓滿解決。三月一日一大早，群眾集結於街上，叫喊「幹掉外省人」，襲擊外省人經營的公司及行人，並波及全島。受傷者和病人開始來到醫院，職員不知如何是好？院長為了避難而未上班，我看到這樣情形，向副院長莊（金座）博士表示現在事態嚴重，應發揮紅十字精神，不分本省人、外省人給予完善診治。很快地，診療工作展開了。事件落幕後，雖然出現有很多本省人的罹難者，但都與我們醫院無關，我想當時的忠告是有用的吧。

三月七日星期日，當時我住在新榮町一丁目山砲隊附近，突然深夜傳來槍聲，由於子彈飛來，我害怕地把榻榻米立起來防備。早上，一個分隊的士兵出現在玄關前面。軍官邊看著玄關的留用日僑證，邊詢問

由此處發射炮彈的事情。我答說我是共濟醫院的醫師，診療貴隊很多的士兵及家屬，並沒有任何武器。就這樣，他們離開了，我因為當天輪值而前去上班。

上午十點，先前的軍官來到我家，提到這裡危險，趕快去避難，內人跑進去。這時事態嚴重，決定到醫院避難，靠著藥局用務員陳先生的幫忙，將第二次行李送出時，我們不知已經發布戒嚴令。用腳踏車載著七歲的長女、五歲的長子、三歲的次女及日用品，通過變成死鎮的兒玉町，避開眼目，好不容易來到醫院，讓孩子們避難。

剛好，小隊巡邏接近玄關，我因向隊長領有到自宅的通行許可而走出玄關。隊長不知是否有看到我，叫著「射殺日本人」，作勢要開槍地跑過來。我迅速地跑進玄關。這時，前一天出院的外省人夫妻出現，他的妻子接受膽結石的手術，已經快痊癒了，並說我是他妻子的救命恩人，因此願意幫我。接著，在別的軍官的護衛下，內人和次子回家搬運最後的行李途中，經過千歲町的櫥窗前，遭到士兵以手槍猛烈地射擊，提心吊膽地抵達家裡。內人把行李堆在車上，背著次子，幫忙在後面推車，慌慌張張完成避難（註三六）。

留用在電信局服務的佐佐木元治則回憶道：

一般來臺的外省人官吏對於臺人橫暴是一項事實。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是一賣煙草的老婦被檢查員毆打，是頗為單純和突發的事件。然而，之所以成為如此大規模的事態，乃是向來臺人心中鬱積對施政的不滿一舉

爆發。已經不記得是那一天，連我服務的電信局也被一群暴徒闖入，那時，擔任局長和職員的外省人都因感到危險而躲起來，只有我還留在局內。一起工作的職員說：「因為你是日本人，他們大概不會加害你吧。之後就拜託你了，可能的話，說服他們溫和地回去好嗎？」就那樣我留下來了。內心正恐懼，暴徒已破門而入，一群人闖入房間時，我的膝蓋正不停地顫抖。其中一名暴徒見到我的時候，罵了一句髒話，突然以武士刀往我胸膛刺過來。我拼命地以日語喊著「請停止暴亂」時，那人說：「啊！你是日本人嗎？」同時將刀收入刀鞘中，溫和地說：「你也是因留用而未回國的，辛苦您了！」嘟囔著：「那些豬已經逃走了嗎？」與同伴用臺語說話，又說：「對不起。」闖入者突然改變態度，安靜地離去（註三七）。

又如留用在基隆水利局工作的內本敬三回憶道：

我記得是二月二十八日那天，由於預料會有暴徒來襲擊，所以外省人職員幾乎都不在了。大概是中午的時候，突然有暴徒闖入。職員中佔多數的臺灣人正頻頻努力勸他們，假如停止水利局的運作，將直接影響到市民的生活。暴徒也不再有任何破壞的行動了。即使現在也常想起，有一個長得與外省人相似的李姓臺籍職員被毆打的事情。當時李君再三解釋：「我是臺灣人。」暴徒的領袖就命令道：「那麼你唱日本國歌吧！」也就是若李君是臺灣人的話，就會唱日本國歌，但若是外省人的話，就不會唱。李君雖然唱了，但由於被暴徒圍住，在恐怖和緊張下，聲音不時停頓，在一旁

的我不安也消失了。李君雖然沒事，但是藏匿在隔壁房間年輕的外省人職員卻被找出來了。其中一名暴徒突然開始毆打他，但是遭到另一名年輕的男子制止了。被制止的暴徒說：「為何要停止？」年輕人勸解說：「這個外省人什麼罪也沒有吧！」結果，這個外省人職員不再被毆打，暴徒們撤退了。我見到這一幕，瞭解他們闖入的目的是不一致的，有以溫和的示威希望政府改革施政者，以及始終挑釁地起事策動暴亂者（註三八）。

由上顯示，暴徒並非盲目施暴，而是有特定對象的，顯然是針對外省人。同時，暴徒中有人是希望透過帶有暴力威脅的示威，促使政府改革施政，並非完全欠缺理性而純然訴諸暴力。

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充分掌握各方面的情報和看法，最後決定派兵「平亂」。三月八日，軍隊登陸基隆、高雄，開赴各地展開鎮壓。留用的臺灣大學法學院教授鹽谷巖三回憶文字中指出：

事件發生後，情勢尚不明朗之際，蔣介石轄下的二十師軍隊秘密渡海而來。這支精銳部隊登陸的同時無蓋的卡車上裝載著機關槍，在市内行軍，在十字路口以實彈開始威嚇性的掃射，實彈咻咻飛過屋頂，我們慌慌張張地緊靠磚牆將身體蹲低，注視著經過的事物（註三九）。

關於鎮壓和綏靖情況，原臺北高等學校畢業生泉新一郎指出：

政府將日治時期從事反日運動者，以及被視為反政府

者、有嫌疑者、甚至是被臺人密告者，不論有罪無罪，一起逮捕並秘密處死。處刑是中國人殘忍的做法，在街上遊街後處死，活活裝入麻袋丟入海中，或是削去鼻子、耳朵，或是以鐵絲刺穿手掌，將兩手綁在一起後在市內示眾，或送至綠島等離島，也有被流放二十年之久的大學生（註四〇）。

另有回憶表示：「事件中，市民和很多領導階級的人遭到殺害，在深夜被用卡車帶走，成為行蹤不明的人也有。」（註四一）

由上顯示，在臺日人的見聞中，鎮壓和綏靖十分恐怖和殘酷，給臺灣社會帶來浩劫。

肆、結 論

綜括而言，臺人對長官公署的不滿，以及迅速累積的民怨，是二二八事件爆發和擴大的根本原因，正如鹽谷巖三指出的：

行政領導中心幾乎全部是從大陸來的人所占有，他們稱大陸為內地，也就是向來的日本人只是換成大陸人罷了，這些蓄積的不滿之爆發就是二二八事件的開端（註四二）。

富澤繁回顧這段歷史時表示：

一般臺灣民眾生活如此的不安，更顯出陳儀政府在經濟和行政上的無能，因政治不信任而生的「民心離離」開始深植臺人心中。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的遠因，即是此種「民心離離」的爆發。此一事件絕非是臺人有計畫反政府運動的開端，其

終究是一偶發事故所致（註四三）。

事件爆發後，長官公署對留臺日人充滿疑忌，再三約束其不得涉入。不久，調派大軍前來鎮壓。留臺日人一面力求自保，一面旁觀整個事件的演變，其對事件的見聞和體驗，較不牽涉個人的恩怨和利害，正因為如此，或可作為適切瞭解此一事件之參考。

【註 釋】

註一：外務省管理局總務部南方課：《臺灣の現況》（未刊油印資料），昭和二十一年二月十日，頁三〇—三二。

註二：佳山良正：《臺北帝大生—戰中の日々》，東京：築地書館株式會社，一九九五，頁一四六—一四七。

註三：竹內昭太郎：《臺灣島は永遠に在る》，東京：八光印刷株式會社，一九九〇，頁一五〇—一五一。

註四：田ノ上家久：《いくさの運命思いつつ—臺灣敢一三八六—部隊吉川隊の日々—》，東京：株式會社クニ企劃，一九九三，頁五八。

註五：島津憲房：《戰時並に引揚げ當時の臺南小史—羽島市長とその施策を想う（二）—》，《臺灣協會報》第二二八號，昭和四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二版。

註六：陳三井：《光復後的政治建設（一）》，《臺灣近代史》，政治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四年，頁三七九—三八〇。

註七：佳山良正：《臺北帝大生—戰中の日々》，頁一七四。

註八：外務省管理局總務部南方課：《臺灣の現況》（未刊油印資料），昭和二十一年二月十日，頁三—四。

註九：古野直也：《臺灣軍司令部 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東京

：圖書刊行會，一九九二，頁二九七。

註一〇：臺灣協會編：《臺灣引揚史—昭和二十年終戰記錄》，東京：該會，一九八二，頁一六二。

註一一：外務省管理局總務部南方課：《臺灣の現況》（未刊油印資料），昭和二十一年二月十日，頁三二—二五。

註一二：外務省管理局總務部南方課：《臺灣關係調查事項》（未刊油印資料），昭和二十一年三月一日，頁二—三。

註一三：佳山良正：《臺北帝大生—戦中の日々》，頁一四八。

註一四：山本守喜：《臺灣に寄せる》，大洋社印刷株式會社，一九八五，頁七三。

註一五：富田奈美：《臺灣引揚げまでの思い出》，東京：朝倉書店，昭和五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頁七八。

註一六：鹽見俊二：《秘録・終戦直後の臺灣—私の終戦日記—》，高知市：高知新聞社，一九七九，頁九六—九八。

註一七：臺灣引揚記編集委員會：《琉球官兵顛末記》，那霸市：臺灣引揚記刊行期成會，一九八六，頁三七〇。

註一八：速水國彦：《島内一般狀況》（留臺日僑會報告書 第四報），昭和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河原功編集：《臺灣引揚・留用記錄》，第一卷，臺灣協會所藏，東京：ゆまに書房發行，平成九年（一九九七），頁一四二—一四四。

註一九：速水國彦：《島内狀況》（留臺日僑會報告書 第八報），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河原功編集：《臺灣引揚・留用記錄》，第一卷，頁三二五—三三七。

註二〇：富澤繁：《臺灣終戦秘史—日本植民地時代とその終焉—》，東京：いづみ出版株式會社，一九八四，頁一八三。

註二一：上山英三、金子滋男：《終戦前後に於ける臺灣の經濟事情》，田村宏編：《殉難行友追悼錄》，東京，中央製本印刷株式會社，昭和三十一年，頁三一。

註二二：外務省管理局總務部南方課：《臺灣の現況》（未刊油印資料），昭和二十一年二月十日，頁二五—二六。

註二三：竹内昭太郎：《臺灣島は永遠に在る》，頁一七八—一七九。

註二四：鹽見俊二，同上書，頁一〇二—一〇三。

註二五：速水國彦：《島内一般狀況》（留臺日僑會報告書 第四報），昭和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河原功編集：《臺灣引揚・留用記錄》，第一卷，頁一四四—一五二。

註二六：速水國彦：《島内狀況》（留臺日僑會報告書 第八報），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河原功編集：《臺灣引揚・留用記錄》，第一卷，頁三二—三三三、三三七。

註二七：鹽見俊二，同上書，頁一六二。

註二八：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編：《臺灣省日僑管理法令輯要》，臺北：該會，民國三十五年，頁一二—一六。

註二九：古野直也：《臺灣軍司令部 一八九五—一九四五》，頁二九六—二九七。

註三〇：竹内昭太郎：《臺灣島は永遠に在る》，頁二三三。

註三一：速水國彦：《留臺日僑會報告書 第一四報》，添付資料第一〇—一三，河原功編集：《臺灣引揚・留用記錄》，第五卷，頁一一三—一一八。

註三二：同上書，資料第一二，頁一六。

註三三：同上書，資料第一六—二二、二七，頁一三二—一五二、一七九—一八〇。

註三四：速水國彦：《木村俊夫遭難顛末書送付に關する件》，昭和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河原功編集：《臺灣引揚・留用記錄》，第七卷，頁一六—四九。

註三五：同上書，資料第二三—二五，頁一五一—一六四。

註三六：臺灣協會編：《臺灣引揚史—昭和二十年終戦記錄》，頁一

六二—一六三。

註三七：富澤繁：《臺灣終戰秘史—日本殖民地時代とその終焉—》，頁一八五—一八六。

註三八：富澤繁：《臺灣終戰秘史—日本殖民地時代とその終焉—》，頁一八六—一八七。

註三九：鹽谷三巖：〈あの頃の事—留用一大學教授の思い出〉，《臺灣協會報》，第三一一號，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二版。

註四〇：泉新一郎，〈想い出すことども—終戦後の臺灣（二）〉，《蕉葉會報》，七十一期，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頁一一。

註四一：林湘琴：《臺灣引揚げまでの思い出》，東京：朝倉書店，昭和五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頁七八。

註四二：同註三九。

註四三：富澤繁：《臺灣終戰秘史—日本殖民地時代とその終焉—》，頁一八三。

作者簡介

姓名：吳文星

年齡：五十二歲

籍貫：臺灣省臺東縣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現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著作：《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日據時期在臺「華僑」研究》等書，以及〈中日修好條約初探〉、〈日據時期臺灣的放足斷髮運動〉等論文八十餘篇。

